

《紫罗兰》

（1925—1930）的
『时尚叙事』

博玖 著



本书以1925—1930年《紫罗兰》四期96卷2000多万字的原始杂志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以杂志中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为研究文本，重新审视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并提出了“时尚叙事”的概念，为重新评价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创作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紫罗兰》

『时尚叙事』
(1925—1930)的

博玖
著



The Fashion Narration in VIOLET (1925-19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罗兰》(1925—1930)的“时尚叙事”/博玫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392—5968—0

I. ①紫… II. ①博… III. ①鸳鸯蝴蝶派—研究
IV. ①I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303 号

《紫罗兰》(1925—1930)的“时尚叙事”

博 玫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URL:<http://www.jxeph.com>

E-mail: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刷厂印刷

南昌市八一礼堂东侧 电话:0791—6268582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开本 17.25 印张

字数:220 千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5968—0 定价:32.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时尚叙事”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概念。在文章的绪论部分，笔者就时尚的概念、性质以及时尚的成因展开论述，阐明时尚与现代社会和商业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时尚叙事”的文化现象。

“时尚叙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于上海商业都市的一种时尚性的另类都市文化叙事，这类风格的叙事以时尚杂志或大众传媒手段为载体，借助时尚性、大众传播的传媒方式占领文化市场，直接驱入都市日常生活的各个时空，并且以生活政治的方式影响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判断，在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亚意识形态的作用。

“《紫罗兰》时尚叙事”，正是“时尚叙事”风格中的文学性叙事。它既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与反传统，也不同于传统的旧文学，更与近代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貌合神离。表面上，《紫罗兰》的“时尚叙事”在叙述方式与叙述内容上，与传统的通俗作品有相通之处，如同样的作者队伍以及以追求趣味和娱乐为主旨的审美精神，似乎是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不合时宜的“倒行逆施”，实际上这种创作风格的出现却是时尚需求的使然，与现代社会和商品文化密切相关。

本书在论述过程中，以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为参照，从现代

性最基本的哲学内涵“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以及西方现代性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客观地论述“《紫罗兰》时尚叙事”的现代性含义，并指出，《紫罗兰》所体现的现代性仅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本土化的现代性，与西方真正意义的现代性根本不同；尽管在1925—1930年上海现代化的上升期，探讨时尚问题无法与探讨现代性问题割离开来，但是以租界为特征的现代性殖民文化只有与本土的文化相融合才能生根，横殖而来的西方现代性在当时的上海必然有着先天的裂痕性。书中还进一步分析了具有裂痕特征的本土化现代性在“《紫罗兰》时尚叙事”中的积极作用，那就是杂志本身所呈现的蕴涵魅力的多元内容和亚意识形态。

本书通过对“《紫罗兰》时尚叙事”的具体论述，阐明了“时尚”与文学尤其是商业性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指出时尚性杂志《紫罗兰》所刊登的作品既是文学作品也是时尚的文化商品，因为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文化产品一旦符合时尚流行的需要，能为商家赢利，商品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则就立马出动，为此操作，使之流传盛行。所以，“《紫罗兰》时尚叙事”的作品中，无论是体现国家权力控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民间自在的亚文化状态，均由于“时尚”的介入而使作品的本意统统被解构，赋予其时尚消费品的特性。此外，本书还进一步阐述作为文化商品的《紫罗兰》具有的积极意义，那就是以“时尚叙事”为叙述手段，依傍时尚和经济的运行规则，将艺术审美与市场利润合理结合，丰富地展现旧上海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多元化的另类文学创作形式和文化空间；并以《紫罗兰》创作中部分成功作品为论据，论述“时尚叙事”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良性关系，即“时尚叙事”为文学所提供的相对“自在”多元的叙述氛围，在这一氛围中文学不仅自觉地演绎出自我的

魅力，而且摆脱了一直来在国家意识问题上争强好胜的局面，以亚意识形态的方式自在、多元地生存着。

“《紫罗兰》时尚叙事”的亚意识形态作用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是本书论述的思想性内容。《紫罗兰》作为经济社会中出产的文化性产品，必定具有两方面的特性：首先，杂志的存在和影响必然会超越一般商品的本来属性；其次，杂志在思想内容上必然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建构紧密地结合。这两个特性在“《紫罗兰》时尚叙事”中，最明显地体现在杂志中以日常生活为审美风格的文学作品和各种广告、栏目所呈现的亚意识形态作用中，《紫罗兰》“时尚叙事”借助于这一亚意识形态作用，超越了自身狭隘的商品文化社会经济的意义，跨入了社会道德的意识形态范畴。因此，在现代性意义上，“《紫罗兰》时尚叙事”带给社会的文化作用，并不亚于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它尽管只借助于日常生活审美和亚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纠结着，但是这种和风细雨的叙述方式或许对人心的改造有着更为深切的影响力。

引 言

本书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通俗文学期刊《紫罗兰》为个案，从一个侧面剖析了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社会背景下的通俗文学创作。“《紫罗兰》时尚叙事”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与现代化社会背景下的商业文化和大众传播密切结合，不仅影响了以通俗文学为代表的商业文学创作，而且在上海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对“《紫罗兰》时尚叙事”内涵的思考和研究是本文的立足点，在研究过程中，本书一方面借助于经济学的观点，全面梳理时尚的概念和性质，以及“时尚叙事”与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借助于现代性的理论，阐释“时尚叙事”中的现代性文化特征、亚意识形态作用及其在上海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

“《紫罗兰》时尚叙事”在内涵上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作为文学概念的“《紫罗兰》时尚叙事”，这一含义直接体现在杂志作品创作中，《紫罗兰》作品叙事中的各种与传统的鸳鸯蝴蝶派风格相异的创作特点，几乎都与“时尚叙述”相关，正是商业文化中的“时尚”和“时尚叙事”导致了他们作品中不自觉的现代性创作理念和创作风格；其次是作为文化空间意义上的“《紫罗兰》时尚叙事”，这一概念顺应着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走向，摆脱了



长期以来文化和文学在国家意识上的争强好胜，使文化在一个自在的环境中，以亚意识形态自在、多元地生存发展，并且在普遍占有读者市场之际，既借助于经济社会的物质条件，又不完全依附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以日常为视觉、以现代性为理念，构建起富有个性的文化空间，展示了上海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多元的艺术与文化。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通俗文学创作极其繁荣，但是对于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和评价却不尽如人意，或简单地归之于商业操纵下的庸俗和媚俗，或以想当然的“现代性”而一味地拔高鸳鸯蝴蝶派创作；至于鸳鸯蝴蝶派作品现代性的意义如何体现、现代性价值的程度究竟如何，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成果，这种现象与文学批评标准的不客观、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彼此不兼容有关。比如在以往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批评中，要么以新文学的标准进行评判而失之偏颇，要么以旧文学的标准进行研究实在又是勉为其难。在这样隔膜的批评标准下，鸳鸯蝴蝶派创作中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都被忽略、湮没了，譬如《紫罗兰》作品中的现代性意义、时尚前卫的观念与现代社会间的关系，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一元化传统社会中单一的价值判断，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繁荣的多元时代。在多元时代里，千姿百态的文化现象只有以相应的价值标准进行评判，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本着这样的出发点，本书所提出的“时尚叙事”概念，或许为客观评价商业社会中的通俗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批评的标准。

《紫罗兰》作品叙事是“《紫罗兰》时尚叙事”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部分内容的论述中，本书不仅以“时尚叙事”为文学批评标准，客观地分析、评价集中在《紫罗兰》中的鸳鸯蝴蝶派的创作，并且以现代性理论为价值判断，具体分析了《紫罗兰》

创作中出现的富有现代性特征的思想内容，并通过对作品中的现代婚恋创作、以日常空间为内容的现代性概念演绎、以女性定位为办刊宗旨的女性主义问题、女性化的审美趣味、同性恋现象以及反现代性的末世情结等等内容的具体论述，客观指出这些内容不仅使《紫罗兰》的作品叙事有别于传统的鸳鸯蝴蝶派创作，而且在现代性意义上体现出与新文学的同步。

作为文学概念的“《紫罗兰》时尚叙事”，其最大特点就是冲击了文学传统中界线分明的观念。对“时尚叙事”而言，只要时尚需求就给你叙事的空间，只要有绝对的读者市场，那么无论是主流还是边缘，统统给你绝对的话语权。在它所提供的文学叙事空间里，各种文学的主张和理念均可以同时存在。这种包罗万象的时尚性的文学叙事状态，使杂志中刊登的文本在意义上失却了唯一性的是与非的评判标准，如在《紫罗兰》三卷中曾接连三期刊登了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曲谱和歌词，四卷中刊登了徐志摩的《青春曲》一诗，甚至还在三卷一号中刊登了蒋介石与宋美龄回乡省亲的大幅照片，还有高尔基的翻译小说与契柯夫、欧·亨利创作的短篇小说等等，这种由不同审美精神和创作风格交织而成的文学创作空间，很难用是与非的唯一标准来判断作品在杂志中的意义，这一充满张力的文学空间，对文学创作观和文学批评观在新时代的更新和发展是有启迪的。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繁荣，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时尚叙事”的叙事风格更富有现实的意义。在新技术手段的带动下，大众文化传播愈演愈烈，文学创作逐渐由文化的中心向边缘滑落，这样尴尬的局面似乎隐寓着文学地位的式微，其实并非如此，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形式的文学叙事方式。本文着重探讨的“《紫罗兰》时尚叙事”所展示的多元化的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



正是为文学在繁荣昌盛的多元化社会环境中如何生存发展、如何寻找新的空间，提供了客观而现实的答案。

在社会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和平时期的文学，无论是主流的国家意识与边缘的民间概念之论争，还是文学界属于主流或非主流在文人间的矫枉过正，这样一些争执实在是寂寞而无聊的，当代文学艺术不仅对此丝毫不予理会，并且彻底地抛弃了旧有的规则，顺应着时代的指挥棒自顾自地走开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现状的不兼容，实在令人心焦！在这个时代里真正意义的文学批评是缺席的！如何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彼此融合，相生相息？实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应该有不同的批评方式，文学是现实生活的显现，如何艺术地表现生活是文学的职责，也是文学批评的职责。在社会经济极度发展的多元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生存也必然是多元的，面对这样多元的世界，如何寻找适应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文学批评模式是极为重要的。

我以为“《紫罗兰》时尚叙事”是符合经济发展上升期文学需求的一种新的文学叙事，它以日常生活为审美精神，将合乎人心、人情、人性审美的文化艺术，游刃有余地展示给市场需求的所有消费者；在创作理念上，它既不违背艺术的内在审美规律，又将文学从新文学以来一直与国家权力分庭抗礼的紧张中舒解出来，以亚意识形态的观念，努力追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同样地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服务。

目 录



序 \ 1

引 言 \ 1

绪 论 1925—1930：“时尚叙事”与上海这座城 \ 1

一、时尚与旧上海的时尚环境 \ 4

二、“时尚叙事”的生存土壤 \ 11

三、现代性与上海时尚叙事的主体性 \ 20

第一章 “《紫罗兰》时尚叙事”的编辑与亚意识形态 \ 31

一、《紫罗兰》的编辑形式及理念 \ 33

二、《紫罗兰》与周瘦鹃的“紫罗兰情结” \ 50

三、“《紫罗兰》时尚叙事”的亚意识形态 \ 60

第二章 “日常叙事”审美与《紫罗兰》表述方式 \ 73

一、《紫罗兰》作品中日常与“现代性”的概念性演绎 \ 75

二、栏目、专号的亚意识形态作用 \ 91

三、广告、封面美女与日常生活叙事 \ 105

第三章 《紫罗兰》时尚情爱 \ 117

一、现代婚恋 \ 122

二、传统婚恋 \ 141

第四章 “都市陷阱”——《紫罗兰》的女性问题 \ 163

一、《紫罗兰》女性定位的意义分析 \ 165

二、《紫罗兰》的女性化审美趣味 \ 184

第五章 都市恐惧症 \ 209

一、都市迷醉中的沉沦者 \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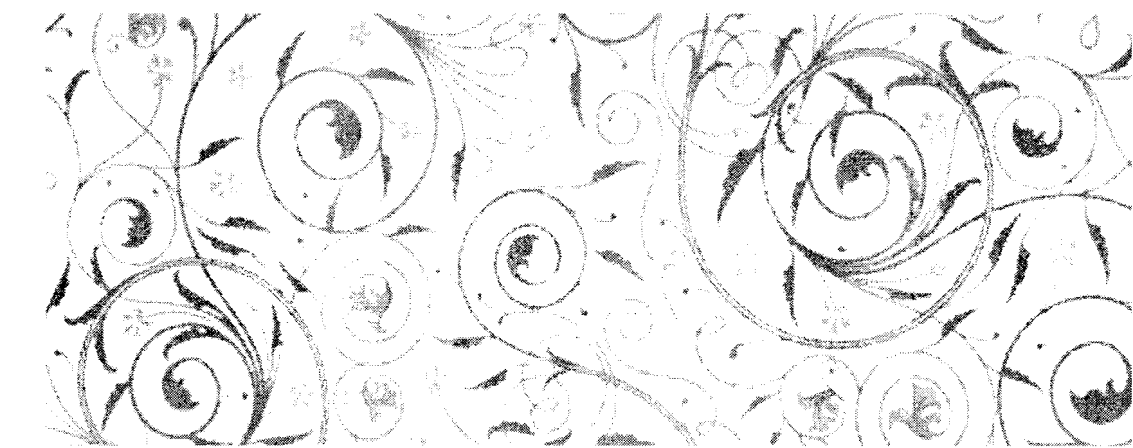
二、没落贵族的末世情怀

——银箫生与梵玲故事的个案剖析 \ 227

三、《紫罗兰》侦探小说 \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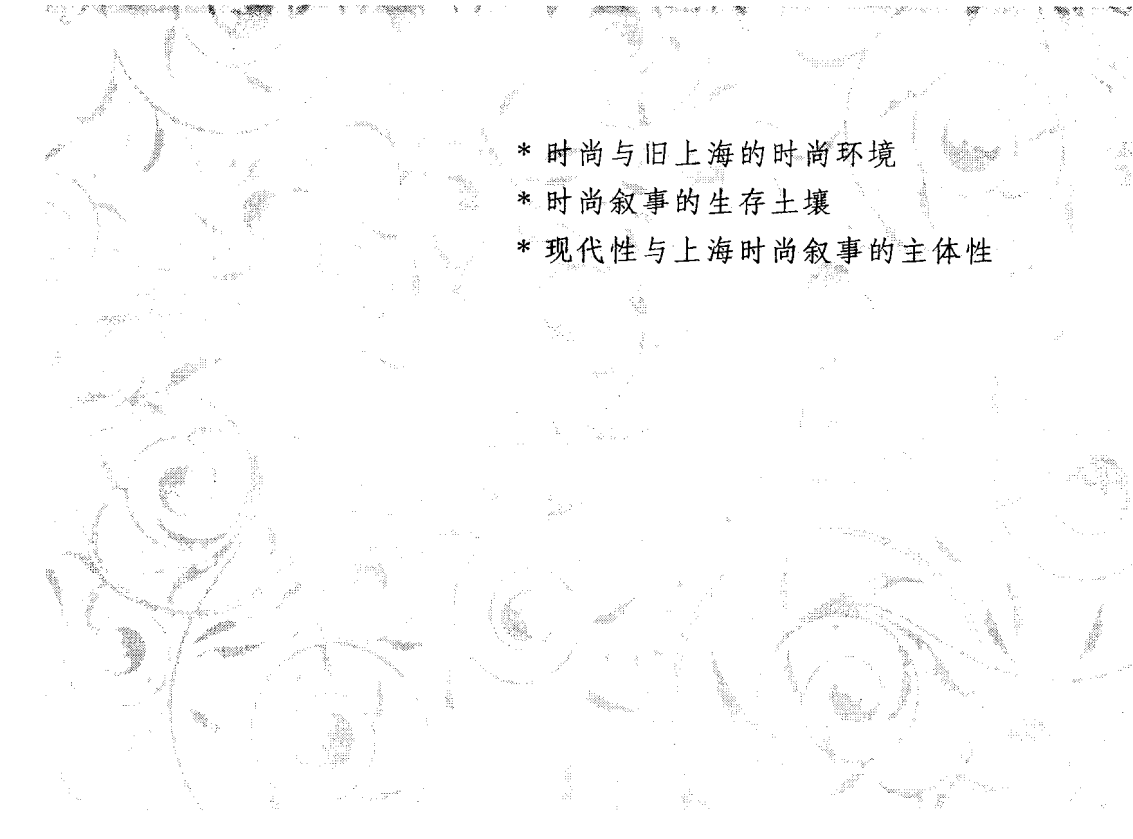
结 语 \ 252

参考文献 \ 255



绪 论

1925—1930：“时尚叙事”与上海这座城

- 
- * 时尚与旧上海的时尚环境
 - * 时尚叙事的生存土壤
 - * 现代性与上海时尚叙事的主体性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1925—1930 年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¹上海时尚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时尚叙事”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商品经济背景的文化领域里出现的一股新潮的叙事方式^①，这种叙事方式借助通俗杂志、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传媒手段，彼此共谋，展示商业性意义的时尚文化艺术，达到透视社会文化生存状态的目的。形式上，“时尚叙事”的形式多元，囊括了文学作品（以通俗文学的创作为主）、美术摄影作品（名画名作、名人肖像、电影明星照、封面美女、30 年代流行的月份牌美人等）、广告作品（以日常消费类广告和娱乐类广告为主，如日用品、时装、美食、健美、彩票、跑马、休闲游乐场所等的广告），甚至杂志的时尚专栏和社会热点特刊等等时尚叙事的具体形式。这种叙事方式根植于商品经济的发达时代，在社会经济与商业文明竞相繁荣的社会环境中，与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相联系，尽其所能地顺应并推动着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因此，“时尚叙事”对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学的创作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

书中研究和探讨的“《紫罗兰》时尚叙事”，正是由“时尚叙事”派生而来的文学叙事风格。这种叙事风格，既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也不同于传统的旧文学，更与近代以来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貌合神离，它以时尚杂志为载体，通过时

① 笔者在本书中所指的“叙事”和叙事学中“叙事”，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本书中的“叙事”专指社会各种文化形态展示性的显性存在方式，譬如外滩的殖民地建筑的显性存在，既是现代化展示，又是殖民侵略史展示，更是上海本土性现代性的显性叙事。这样一种“叙事”概念，完全脱离了以往只拘泥于文学现象的虚构性现实研究视觉，而是将“叙事”直接融入了火热的社会生活中，运用“叙事显性”的表达方式，透视社会的不同层面和角度，迅速占领社会各个领域，进而达到展示社会、叙述社会的目的。

尚性内容的文学创作占领文化市场，与都市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二三十年代受到读者们的欢迎。

一、时尚与旧上海的时尚环境

在谈论“时尚叙事”之前，有必要厘清时尚的概念与性质、时尚与商品经济社会之间的依存关系。

何谓时尚？《辞海》依据时尚的性质、特征和内容，将其定义为：“一种外表行为模式的流传现象，如在服装、语言、文艺、宗教等方面的新奇事物，往往很快吸引多数人采用及模仿，流传很广。表达人们对美的爱好和欣赏，或借以发泄个人内心被压抑的情绪，属于人类行为的文化模式的范畴。时尚可看作习俗的变动形态，习俗可看作时尚的固定形态。”

“时尚”一词是由英文“fashion”翻译而来，其通用译意是“流行”。但是笔者以为，流行与时尚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流行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上流传很广、盛行一时的大众心理现象和社会行为，时尚则仅属于人类行为的文化模式范畴内的流行现象。

从《辞海》的定义中还可以知道，“时尚”最明显的特征在于“趋时求新”，这一特征使得时尚与物质世界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地结合起来，比如各种观念的流行需要书籍和传媒手段，各种新奇的消费方式的流行需要消费品为载体。

此外，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时尚”还需要服从“奢侈

原则”。譬如在原始部落和农业社会中，社会下层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选择的自由，“时尚”仅仅流行于上流社会和有闲阶级成员之间，由此成为他们相互攀比、争奇斗艳的“贵族现象”。这种现象通常借助“炫耀性消费”^①得到表现，目的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尊贵的社会地位，强化自我的权势。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时尚的传播不再以社会上层为唯一的介质，但是“炫耀性消费”并没有随贵族阶级的灭亡而消亡。相反，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时期，“炫耀性消费”进入了更为广泛的阶层，甚至成为一些地位低下的社会阶层企图超越自卑、向上抗争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成为个性追求、自我实现最便捷的一种手段。

在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下，时尚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商品消费世界的新奇丰富、现代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如果离开这一切，所谓的“时尚”就无从谈起。

笼统地说，时尚就是趋时求新、追求个性，通过商品消费的手段直接介入社会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以商品消费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心理，具有亚意识形态的作用。

在形式上，时尚可以区分为“雅俗时尚”和“媚俗时尚”两大类。

^① 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1899）一书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他认为时尚最初起源于社会上层阶级的奢侈和对奢侈的炫耀。“炫耀性消费”的目的不在于“消费”而在于“炫耀”，使之成为上层阶级身份的象征和增强个人地位的有利手段。（转引自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页）。